

少数民族文艺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钟世华

广西各民族人民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大图绘中多彩的一笔,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般重要的创作力量,他们既带有本民族的文化气韵,又以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高歌猛进。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民族团结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的主题,对对新生活的歌颂、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到和平信念、民族团结、生态关怀、人性书写等,无不彰显着时代精神。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体裁多样,但都有着共同的立足本土、胸怀祖国的创作特点。作家们都以坚定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礼赞,将自己所置身的多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书写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包括壮族的陆地、韦其麟、黄勇刹、莎红、韦一凡、华山、王云高、孙步康、岑隆业、古笛、农冠品、凌渡、蓝阳春、冯艺、石才夫、凡一平、黄佩华、韦俊海、李灼热、韦佐等,瑶族的蓝怀昌、莫义明、蓝汉东、光盘、红日、班源泽等,侗族的苗延秀、张泽忠、莫俊荣、杨仕芳等,仫佬族的包玉堂、鬼子、潘琦、包晓泉、潘荣生、何述强、常剑钧等,回族的白先勇、海力洪、海代泉、马玉成等,京族的李英敏、潘恒济、张永东等,苗族的李荣贞、杨文升等,毛南族的谭白安、谭云鹏、谭亚洲、莫景春等,水族的李果河、潘文佳等,仫佬族的郭金世等。这些作家来自不同的民族,对地处西南的八桂大地有着多元的认知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既书写对故乡的守望,又表达人性共有的感受。在他们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许多生活于民间文化沃土中的西南各民族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以不同方式呈现了广西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有着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文化基础和革命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壮族作家高孤雁、曾平澜、韦杰三怀着强烈的民族国家忧患意识,创作了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学作品,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以历史的宏观视野,进行民族国家话语的表达,在崇高与宏阔中深化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张力。1953年,韦其麟自觉加入到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其成名作《百鸟衣》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古卡和依娘的形象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陆地的长篇巨制《瀑布》具有史诗一般博大和纵深的品格,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开创了广西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史诗形式创作的先河。李英敏的《椰风蕉雨》讲述战斗英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新时期以来,新一代的作家们积极继承了这一传统。黄佩华的长诗《生生生长》中的家族变迁史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石才夫的诗歌《旗帜》《山河铭记》《爱的清明节——献给山魂》等表达了诗人对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的英烈们的崇敬与怀念。赵先平长篇小说《穿过密林》运用传奇的叙事手法讲述左江地区的革命历史。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描写一群失散的红军各自遭遇的不同的命运,给读者讲述了一段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事。广西各族人民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书写,在抵御外辱、保护家园的革命斗争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塑造各民族优秀的人物形象,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要想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挖掘各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包玉堂创作的叙事长诗《虹》取材于苗族民间传说,塑造了聪明能干苗族女孩花姐姐的形象。苗延秀的长诗《大苗山交响曲》表达了苗族人民热爱和平、追求民族团结、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韦其麟的叙事长诗《凤凰歌》塑造了一位为了人民的胜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壮族巾帼英雄达凤的光辉形

象。常剑钧的历史悲剧《瓦氏夫人》塑造了抗击倭寇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形象。莫义明的小说《八角姻缘》塑造金福廷、陶扶强、亚培、果英等性格各异、形象丰满的人物,展现了瑶族人民的美好品德。潘琦的许多作品讴歌不同民族间的患难与共、互敬互爱,塑造了健康美好的各族人民形象。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弘扬善与美的艺术追求,并在这些优秀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推进民族团结。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体现了民族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创作追求。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视角表达政治参与的热情,用积极健康的笔触歌颂新生活。王云高的代表作《彩云归》书写了渴盼祖国统一的主题。莎红的诗集《山欢水笑》反映了各民族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崭新风貌。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写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觉醒、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和土改斗争的胜利。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展示了一群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追求与创新的瑶乡儿女形象,表现了瑶族人民走向现代的心灵历程。谭亚洲的《狩猎毛南山》描写了老猎人三伯智擒糟蹋庄家的猴群为寨子除害的故事。李果河的《阿贵嫂和她的水饺店》描写了阿贵嫂顺应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得法,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了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国家利益的价值认同,并在积极开拓新生活的努力中使“个人”得以与国家相连。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聚焦脱贫攻坚,展现走向新时代的崭新精神风貌。近些年来,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八桂大地各族人民当代命运的叙述,构成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叙事维度。红日的小说《驻村笔记》生动地呈现了精准扶贫的攻坚场面,并真实地刻画了河池县天马乡一群有理想、有情怀的扶贫干部形象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情态的表现,显示了乡村人民群众和扶贫干部的善良与正气,彰显了广西人民的拼搏精神。罗南的长篇纪实散文《后龙村扶贫记》全景聚焦广西百色凌云县后龙村精准扶贫工作,以女性温情的笔调写出后龙村从贫困走向脱贫的攻坚历程。林超俊的报告文学《红土地上的秀美人生》和《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以真实事件为基础,通过生动具体的细节呈现,讲述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的故事。韦佐的《巴某蝶变》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讲述了一个村子从深度贫困村向最美乡村蝶变的故事。作家们自觉参与了时代主流文化的大合唱,在更广阔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表现地方生活和地方经验。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展现多元文化主题,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生活在八桂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从多民族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的书写,还是生态保护、苦难主题的挖掘,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表现出开阔的审美意识。何培高的长篇报告文学《哭了笑了》讲述少数民族孤儿学校的感人故事,传播社会大爱,凸显人性光辉。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小说体现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挖掘社会底层人生的苦难,对生与死进行了深刻的观照。冯艺的散文集《桂海苍茫》《朱红色的沉思》、黄佩华的小说《河之上》《杀牛坪》、凡一平的小说《天等山》《蝉声唱》、陶丽群的小说《母亲的岛》、韦俊海的小说《复仇的麻雀》、李明媚的小说《在路上寻找春天》、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等作品以深沉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原乡意识等多元主题,唤醒故乡的记忆,将广西地理景观中的一河一山,融入人文复忆锦山河。总之,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多重审美向度,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在当代内蒙古文学的起始阶段,以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为代表的作家们就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之情,为新生的内蒙古文学奠定明亮饱满的爱国主义基调。这一优良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一脉相承,不断汇聚成时代的强音。这些由多民族作家展开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创作实践,抒发守望相助深情,喜看绿水青山新变,记载脱贫攻坚胜利,颂扬团结奋进精神,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十年的内蒙古长篇小说大约有100部,作家们深耕草原沃土,重视多民族文化交往互鉴,十年创作征程步履铿锵。其中,冯苓植、阿云嘎、路远、包丽英、萨仁托娅、海伦纳、白金声的历史叙事,或回望祖先往事,追索草原文化性格的雄健与豁达,或再现草原上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镂刻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暗夜里寻找光明的不屈不挠。这些创作带着中国北疆高原的持重高远、草原的明快清新、山林的深邃神秘,成为内蒙古丰富文化与多样地貌的文学镜像。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家们深刻感受到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巨变。力格登、李廷航、萨娜、张凯、乌力吉布林、格日勒图等作家对时代大潮推动的社会变迁有着敏锐的体察和深刻的思辨,既将那些嬗变放置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也具体而微地落实在生活细节和情感末梢。他们的文学实践践行现实主义精神,大胆拿来现代主义技法,表现本地区一日千里、阔步开放的发展态势。经由多民族作家的十年之功,涌现出许多奔流着新时代踔厉奋发血液、满载着民族复兴激情的人民史诗。

新时代让内蒙古的作家们有了更多的机遇,能够在多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之间辗转迁移。这成为新时代内蒙古中短篇小说佳作频出的密钥。例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居处的文化场域更为复杂,多重文化让他拥有开阔的写作视域。《清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中那个远道而来感受脱贫攻坚巨变的异乡人,《巴桑的大海》中从草原出发航行世界的巴桑……这些新时代的迁徙故事,是发生在祖国各地的鲜活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的进取革新气象,还表现为对各种文学手法的探索。“80后”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七角羊》《醉驼》以随处可见的通感手法、多变的叙事视角精准写出在沙漠生存的粗犷的生命经验。“90后”蒙古族作家渡澜在《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去看乌嘎跳舞》中,以魔幻、荒诞、意识流和亲身体验,反复书写生命的消失和重生。新锐作家们那些变形与荒诞的文学景观最终呼唤的,是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这始终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报告文学作家立足时代现场,书写现实的巨变。生态建设、文化建设、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是这十年内蒙古报告文学的重要主题。为伟大时代留下生动写照,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同心共筑共有精神家园,报告文学迸发的艺术力量令人惊叹。

生态主题的报告文学集中书写沙漠变绿洲的传奇故事。《毛乌素绿色传奇》《额济纳河畔》《装点此河山》《达拉特·金色与绿色变奏曲》书写内蒙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曾经的荒芜,被几十年如一日地攻坚克难,转化为一篇篇绿洲,体现了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乌兰牧骑造就了中华民族文艺百花园中独特的文艺景观,也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大创举。以《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开往赤峰的K896次列车》为代表的报告文学讲述了乌兰牧骑的发展历程。北方幅员辽阔,通过乌兰牧骑,党和国家将温暖的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内蒙古文学

□崔荣

怀、共有的精神追求传递给广大农牧民,数十年来不曾变过。细写这一过程,也就写出了共有精神家园怎样一砖一瓦建成,又如何以美的方式有效传播。

共同的精神追求,同样是凝聚人心的强大纽带。脱贫攻坚主题和抗疫主题的报告文学在书写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价值认知的同时,就凸出了爱国为民的精神追求。以《春风染绿红山下》《让世界看见》《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书写内蒙古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硬仗中打出来的永不屈服的时代精神。刘春作为深入武汉抗疫一线的亲历者,他所写出的《天使出征》记录了内蒙古医疗队千里驰援武汉的那些心手相牵、同心抗疫的难忘现场,读来总令人震撼。

宛若石榴花开,无论是哪一种主题,新时代十年内蒙古的报告文学汇聚成一个总主题:爱国团结,守望相助。当这些时代新章汇入到新时代中国故事书写的洪流中时,本就牢固的共同精神归属便更加清晰温暖了。

新时代十年的内蒙古诗歌和散文,同样展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观。在这些作品中,家国情怀深沉,文化底蕴深厚。阿古拉泰、白涛、温古等以草原诗人的自觉编织诗歌的梦想,形成新时代10年内蒙古诗歌的多维创作取向。阿古拉泰的诗歌磅礴悠远,坚定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构成诗歌的内在筋骨。《百年寻梦》以泼墨之笔渲染党如何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雄壮历史,又如何今天在“手挽着手,将圆一个民族的梦”。《仰望一匹腾飞的骏马》书写内蒙古的发展速度,“请祖国放心内蒙古腾飞脚步/将永远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和祖国的爱一起跳动”。《黄河,我想》具象地表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乡愁在内蒙古诗人笔下以故园之思进

行表达。白涛以《短调或长歌》隐喻身在都市者对古老游牧生涯的向往,这乡愁带着民族特性,但更具现代性。温古的诗笔依循农事经验行进,“土地替我们驯化农具/农具替我们驯化一双笨拙的手/手替我们驯化一颗心灵”,这让农业文化的秘密不再深藏。这是新时代草原诗歌的特点:传统和现代、都市文化和游牧文化、城市文明和乡村物事,都是其诗歌肌理饱满丰富的源头活水。草原诗人的视线从未自守于草原,而是视野辽阔。这正如中华文化的从来都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也正体现着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时代气质和复兴气象。

一直围绕草原、河流等世间万物走笔的,有特·官布扎布、艾平、苏莉、杨瑛、安宁、刘志成、王樵夫等散文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的草原文化,强调珍爱和敬畏自然。新时代10年的散文作者跨越民族和区域限制,不约而同地伏身草间、静听万籁,又从山川俯瞰世间四季轮回、天地万物生长、时光长河奔流。例如,艾平在草原古老的游牧文化中发现其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境界的契合。她在蒙古族的长调中写出了《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等格局开阔的散文作品。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在散文集《万物的样子》中从万物中回到自己,继而发现万物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用韧性面对、接受和化解困境。蒙古族作家杨瑛的散文集《河流》中诸篇,以中华美学的“静趣”观照万物,表达出一种生命之叹与时光之思。正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才让多民族的散文家们把握素材、表现世界时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风度。

总之,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文学实践向心力的强化,与党和国家的引领、关怀和扶持息息相关。无论是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少数民族作品重点扶持项目还是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都在激发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更是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注入强劲动力。新时代新征程,那些爱国主义的深情、团结互助的笑颜、永不歇息的奋斗、波澜壮阔的巨变,将会不断汇聚成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声音

诗歌潜藏了人们内心生活的珍贵秘密

□阿苏越尔(彝族)

更多的好戏还在后头。在朦胧诗发展数年后,更加年轻的诗人们不想亦步亦趋,他们渴望变化。与朦胧诗的深刻和尖锐相反,以浅白和嬉皮士精神为标榜的口语诗适时出现。他们试图用低微代替崇高,用简慢代替仪式感,用直截了当代替比喻象征……把诗歌还给普罗大众,口语诗可谓用心良苦,亦有所成就。但是,诗歌最终还是讲究一种曲折表达,不能过于直白,这源于人类心灵及心灵所寄托的物质世界的神秘性和隐蔽性。

这个时候,在不起眼的大西北,一群来自内地的诗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面对大漠孤烟,这一群血性汉子很快就吐出了与天地交互的诗迹。他们的诗歌粗犷、宏阔、昂扬,吞吐着天地之灵气。人们称这个主要由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等诗人组成的诗歌群体为新边塞诗派。在我看来,新边塞诗属于高难度写作,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心灵的燃烧。当生活环境变迁,心力减退,诗劲衰退,诗坛再不见新边塞诗人们的倔强和洒脱。

当时代发生新的变化,如果一个诗人还坚持原地踏步,他的主张将迂腐,他的创作将落伍。历史上,中国汉语诗歌从来不曾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隋唐以降,诗歌意境和音韵的创造上更是日臻完善。只有在诗歌中,汉字兼具的“形、音、义”特色才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拓展。刘禹锡有“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之叹。几千年来,为揭示世界和心灵本身的隐蔽和神秘,诗人像语言的炼金士,淬炼和扩展了日常的语言,使日常的语言更加凝练和华美。努力没有白费,通

过词语的精挑细选,诗歌尽可能揭示了人类隐蔽和神秘的心灵,一次次呈现了诗人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脉搏和心跳。

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手靠训练和学习,也靠先天的悟性。当然,纯粹的炫技应该摒弃,诗歌的技巧一旦脱离了内容表达的需要,就显得花哨和浮夸。没有深刻的观念 and 厚实的情感支撑的诗歌是玩弄自己 and 读者。如果把文字喻为石头,诗歌的文艺是精品,是玉石化,而不是河滩上随处可以捡拾的一块块鹅卵石。好的诗人是文字中神秘力量的探幽者。假如诗意没了,诗思也没了,留下庸常的语言记录,别的文体也能达到,那诗歌的使命亦可以休矣。

这么推崇诗歌语言材质的非同寻常,也许有人会辩称:诗歌要让人看得懂,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创作取向。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起初对我们而言是很深的。任何艺术都不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毫无余味,而是要引领读者去思索、回味、提升,最终与作者神会,共同迈向艺术的无限时空。

新诗已逾百年,百年期间,关于诗歌的观念不断在变。到了当下,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写诗,林立的诗歌流派消失了,五花八门的诗歌主张也不提了。八十年代的各执己见与现在的迷迷糊糊,没有谁高谁低,但放在一起解读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

诗人要忠实于自己。生活和思考是第一性的,写作永远是第二性的,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就会有什么样的书写。你只能生活在时代之中,你也只能是人民中的一员。当然

有一点必须承认,好的诗人是那些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诗人。一个诗人在表达自我的喜怒哀乐的同时,对别人的悲欢离合不能漠不关心。诗人要在时代的洪流中、在人民的海洋里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样的诗歌书写才具有价值和光芒。这种独立的写作精神,基于道义和担当。

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无论何种写法,诗歌必须提振人类生活的信心。诗歌始终是心灵的艺术。诗人应该尝试着在文字中传递温暖,把人类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这是诗歌事业经久不衰的唯一理由。毋庸讳言,我们曾经在诗歌烛火的照明下,度过苦难和贫瘠的人类生活的童年。因为诗歌,过往的情感栩栩如生地保留了下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饶,过往的火炬还在燃烧,它需要照明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大。从心灵需求的角度讲,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年代,诗歌的照耀应当无处不在,诗人的身影也应当无处不在。

在新媒体时代,诗歌的传播是越来越便捷了。博客和微信时代的诗歌模式开启,各种诗歌交流群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人们在“群”里尽情展现最新的作品,相互击节叫好,彼此点赞留言,不分高低,不论老少,景象一派蔚为壮观。从积极方面讲,诗歌的群众基础貌似在扩大;但从专业标准来说,微信诗太多碎片化、随意化、表面化、自我化,更多是现实生活的临时反应,缺乏诗歌必要的技法和精神含义,遑论创新和深度思考。因此,这些作品和现象在增加诗歌群众基础的同时,也引发了诗歌精神瓦解和诗意空白之担忧。自娱自乐中,现实的拷问少了,人性的自省少了,道义担当少了。在我看来,纸质诗刊毕竟经过了专业编辑的层层筛选、把关,相对值得信赖一些,当然也都有很多提升空间。

诗人流沙河说:“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诗,那就是感情上的残疾。”每一个时代都将因为那些伟大的诗歌而散发出生动的光芒,它照耀当下、启示后人。为此,我们需要把心思从摇曳不定中找回现实。主动观照现实、融入时代命运的诗人,是值得敬佩的。诗人不一定成为时代生活的“面子”,但诗人应该主动担当,成为这个时代的“里子”即良心。